



薛福成

外交思想研究

刘悦斌 著

清著名外交人物，

身于曾国藩幕府，曾长期追随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

任清政府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4国公使。

一位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国家处于转型时期的外交家；

一位身处从传统的东方朝贡体制向近代国际关系体制转变的过渡时期的外交家。

一位新旧杂陈、带有鲜明过渡时代特征的外交家。



薛福成 外交思想研究

刘悦斌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薛福成外交思想研究 / 刘悦斌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 - 7 - 5077 - 3794 - 3

I. ①薛… II. ①刘… III. ①薛福成(1838 ~ 1894)
—对外政策—思想评论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8266 号

责任编辑: 战葆红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 - 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880 × 1230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序 言

19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侵略势力的入侵,中国开始融入到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去,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在逐渐地发生变化,逐渐走向现代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不得不以西方国家为目标,采纳西方国家的标准。其中,外交制度、外交观念表现得尤为明显。

现代国家间的关系是由在欧洲首先形成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规定和约束的,19 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人,对此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实际上也根本不屑于去了解。由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有自己的发展程度,形成了中国人的优越感,因而在对外国的关系上,中国人常有天朝上国、怀柔远人的观念,有夷夏有别、以夏变夷的观念,是居高临下、俯视蛮夷的态度。清朝政府有两个负责与外国打交道的机构,一个是理藩院,负责与朝鲜、越南、缅甸、琉球等藩属国有关的事务;一个是礼部,负责与中国没有封贡关系的国家的事务,当然主要是西方国家,当时清政府把西方国家遣来使也看作朝贡。

鸦片战争后,传统的中外关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进行侵略,其次是西方国家逐渐蚕食中国周边的藩属国,于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内容,迫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与这些国家频繁地就关系到中国重大利益的事务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关系观念的变化、外交制度的转型就是势所必然的了。本书就是研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薛福成。

本书是刘悦斌在十多年前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主要是把薛福成作为早期维新思想家来看待的,对他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研究很少,这是当时悦斌选择薛福成外交思想做博士论文进行研究的背景。他的博士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好评,顺利通过了答辩。但是,研究外交人物,特别是涉及具体的外交活动,仅有中文文献是不够的。薛福成曾经担任中国驻英公使4年多,英国方面肯定有不少与他有关材料,当时限于条件,悦斌没有能够利用。此后,他发表了几篇文章,把部分研究成果公之于学术界。近些年来,史学界对薛福成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的研究多了起来,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做比较全面深入研究的著作还很少,都没有使用英国方面的材料。几年前,悦斌得到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到英国访问研究,期间搜集了有关材料,丰富了薛福成研究的相关论据。本书把薛福成置于晚清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分别探讨了薛福成外交思想的成因、对中西关系变化的认识、对藩属国的政策主张、对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接受与运用、对内政与外交关系的认识等,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薛福成的外交思想和活动,并把薛福成的外交思想与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外交思想进行了对比。他认为,薛福成作为晚清社会转型时期的外交人物,他的外交思想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外交思想的特点,既有对传统外交观念的因袭,更有对新的现代外交观念的吸纳和运用,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可以成立的。另外,他把薛福成的维新思想也作为他外交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论证了薛福成改革内政的思想与外交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很好的处理方式。

值此悦斌的书出版之际,写上面几句话,算作序言。同时也希望悦斌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更多的贡献。

王庆成

2011年5月

引言

公元 1840 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更是中外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在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它有了里程碑般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是一个雄视东方乃至“天下”(中国人所知的“天下”)的大一统帝国,她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古代文化,是“天朝上国”,她周边的朝鲜、越南、暹罗(今泰国)、南掌(今老挝)、缅甸、琉球等则是定期向中国皇帝朝贡的藩属国,构成为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①从 16 世纪以降,虽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漂洋过海东来,同中国有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以贸易为主),但是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只是把他们当成仰慕天朝的“远人”,以宽广的胸怀慷慨地允许他们为了生存而来华贸易,^②根本没有将其当作可以平起平坐的国体,更不屑于去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地理和政情民俗,以致当英国的大炮在天朝的大门口轰然炸响的时候,道光皇帝还在向他的臣下询问在今天看来简直是荒唐可笑的问题:“噶咭喇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来往?”

① 关于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详见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梁伯华:《近代中国外交的巨变——外交制度与中外关系变化的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1990 年。

② 1893 年乾隆帝给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敕谕有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餘润。”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 276,页 13,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影印本;梁廷枏:《粤海关志》卷 23,贡舶 3,页 8,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19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除喋喋查（Henry Pottinger）系该国王所授，此外各伪职是否受自国王？抑即由带兵之人派调？……”^①

终于，“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②接触的结果，是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被资本主义列强一项项地攫夺，藩属国一个接一个地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传统的“天朝体制”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如何与拥有一套全新的价值观念并正在以其磅礴的气势用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成了近代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课题。本书的主人公薛福成就是在这方面颇多贡献的一位外交家兼思想家。

薛福成生于1838年4月12日，卒于1894年7月21日，号庸盒，江苏无锡人。1865年夏入曾国藩幕府，1875年夏末入李鸿章幕府，随李鸿章办理对外交涉等事务。1875年，向清政府上《应诏陈言疏》，有“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多为清政府陆续采纳，声名鹊起。1879年撰《筹洋刍议》，计有约章、边防、邻交、利器、敌情、藩邦、商政、船政、矿政、利权、变法等14篇，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时局的看法，阐述了他的改革思想，为洋务思想的代表作之一，李鸿章等极为欣赏，时人争相抄阅之。^③同年，清政府拟任命中国海关总税务

①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谕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7，页18，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②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③ 薛福成：《筹洋刍议》自序：“既属稿，以呈伯相北洋大臣合肥李公，公大颺之，为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采择。岁辛巳，余友遵义黎庶昌以出使西班牙参赞，超授出使日本大臣，至自西洋，携一册示余，且曰：囊过伦敦使馆，见曾侯（曾纪泽——引者）案上有是书，讽玩数周，心益异之。手写一通，请曾侯用泰西糖印法印得数十册，稍贻同志，今且尽矣，而索者未已也。”此后仍有“友朋时来借抄不辍”。薛福成：《筹洋刍议》，清光绪《庸盒全集》，以下引薛福成文，凡未注明者，均据此刻本。

司英国人赫德兼任总海防司,总管中国海防,大臣中颇有反对者,薛福成亦上书李鸿章请止之,清政府终罢此议。1884年夏,授浙江宁绍台道,实际主持了浙东的抗法斗争,与法国兵舰相持四五十日,法人卒不得逞,论者谓其与镇南关之捷相匹敌,因功加布政使銜。1889年5月,被任命为清政府驻英、法、意大利、比利时四国公使,在任期间,负责与英国谈判滇缅划界等问题,并为海外设领保护华侨等做了不懈的努力。其间补授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1894年夏任满回国,旋病逝于上海。^①

薛福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对此史学界并未忽视,自20世纪50年代即有学者对其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几乎每一本近代通史著作都会提到他,1988年他的家乡举办活动纪念他诞生150周年,《无锡文史资料》第20辑出了纪念专辑,1994年12月又举行了有40余人参加的薛福成学术研讨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辑出版了有关论文资料集(《东林党学术研讨会薛福成学术研讨会——论文资料集》,1998年)。对薛福成研究较早、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是上海《解放日报》高级编辑丁凤麟先生,他1983年即出版了《薛福成》,虽然该书还嫌简略,但是毕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薛福成的传记。此后,他又与人合作编辑出版了《薛福成选集》,整理了薛福成《庸盦笔记》,1998年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出版了他撰写的《薛福成评传》,在薛福成研究方面厥功甚伟。《薛福成评传》虽然侧重于探讨薛福成的思想,但实际上是对薛福成一生思想和事功的全面研究,包括了薛福成思想的形成、在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府的经历与活动、在中法战争中的

① 关于薛福成的生平和事迹,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1册,第12480~124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15册,第4599~46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夏寅官:《薛福成传》,钱基博:《薛福成传》,俱见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卷13,《清代碑传全集》下,第1338~13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费成康《薛福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丁凤麟《薛福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本书中不再对薛福成的生平经历辟专章介绍。

表现、奉使泰西期间的作为、变法思想、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考察等,是迄今为止关于薛福成的最为详尽的传记。

史学界对薛福成的研究虽然起步很早,但是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成果却不能说多。美国历史学家赫兰德(Douglas Howland)也注意到,“在薛福成出版他的《出使四国日记》之后一百年来,历史学家对薛福成及其著作一直有些漠不关心。除了标准的清代人物传记会有他的词条外,其他地方很少写到他。”^①据笔者当时统计,自20世纪50年代至1995年共发表薛福成研究论文16篇,而且,有限的研究成果存在至少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对薛福成的一般性介绍多,专题研究少;第二,在对薛福成的研究中,对他的改革思想和经济思想的研究多,其他方面的思想和活动研究少,其原因盖在于他首先是以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身份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被看作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判断的根据主要是他经济方面的主张。其实,薛福成还是晚清著名的外交人物,有学者明确指出:“他一生的成就……主要在外交方面。”^②美籍著名史学家徐中约也认为:“以同时代西方外交家的标准来衡量,早期的中国驻外公使显然过于平庸,一个令人高兴的例外是著名的曾侯(曾纪泽),他可能比同时代的许多西方外交家都要优秀,在他前后担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和薛福成也应被视为出色的外交家,其他公使则只能说是使馆的管理者,不能说是积极主动的外交家。”^③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史学界对他的外交思想和在外交上的成就却研究甚少,有数的论文中从外交方面研究的寥寥无几。鉴

① *The European Diary of Hsieh Fucheng, Envoy Extraordinary of Imperial China*. p. xiii. Translated by Helen Hsieh Chien, Introduced and annotated by Douglas Howl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② 吴万颂:《薛福成对洋务的认识》,载《大陆杂志》第47卷第3期,转引自王戎笙《台湾清史研究文摘》,第631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③ Immanuel C. Y. Hsu: *China's Entrance in 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 pp. 197—19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于此,我不揣简陋,从那时起选择了薛福成外交思想这一题目进行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史学界对薛福成的研究日趋重视,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的范围也从他的维新思想扩展至他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举其要者,一是前述丁凤麟先生的专著《薛福成评传》;二是一系列专题论文,这些论文有不少是专门论述薛福成的外交思想,或涉及他的外交思想,举其要者,有郭双林《晚清香港设领问题初探》、余定邦《清朝外交官眼中的香港和中英关于香港设领的交涉》,虽然似乎不是专门研究薛福成,实际上主要是涉及薛福成,对薛福成在香港设立领事的努力做了综合性的研究;朱昭华《薛福成与滇缅边界谈判研究》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对以往关于薛福成与中英滇缅界务谈判的研究做了中肯的评析,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对薛福成抱一种理解的态度;夏泉《试论晚清早期驻外公使的国际法意识》认为早期驻外公使中,最早提及国际法的是薛福成;何永明《薛福成对新疆问题的认识》则从薛福成对新疆形势的认识和对新疆问题外交策略的认识两个方面做了全面分析,认为薛福成的认识虽然不无偏颇,但所提出的外交策略能切合当时中国在新疆面临的形势,并在实际外交中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我也发表了几篇相关的论文,涉及薛福成对越南、缅甸、坎巨提等藩属国的政策主张,薛福成对国际法的接受和运用,薛福成对内政和外交关系的认识等。

总的看来,史学界对薛福成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缺乏对薛福成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二是研究者迄未利用国外方面的外交档案,薛福成担任中国驻英国公使将近4年半,在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中留下了不少材料。我有幸看到了这些档案材料,从而可以将对薛福成的研究建立在更为丰富的资料基础上。

所谓“外交”,享有盛誉的《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一书援引《牛津英语辞典》的解释:(一)通过谈判处理国际关系;(二)由大使和使节们调整这些关系的方法;(三)外交家的业务或艺术;(四)处理

国际交往和谈判的技能和谈吐。简单一些说,“外交是运用智慧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①我认为,外交思想即指一切与外交有关的主张和观念,既包括原则性的,也包括策略性的、技术性的。下面,即根据这一理解对薛福成的外交思想进行探讨。

^① [英] 戈尔-布思主编,杨立义译:《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第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另参见[美] 威廉·奥尔森等编,王沿等译:《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第17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目 录

序 言	1
引 言	1
第一章 思想成因	1
一、从时文制艺到经世实学	1
二、曾国藩、李鸿章及其幕府的影响	6
三、对中外关系的认识:变局观	18
第二章 旧思想的因袭与改造	29
一、“守在四夷”的传统思想	29
二、援护越南——“守在四夷”	32
三、滇缅划界——“守在四境”	41
四、会立坎苗——争两属体制	54
五、对晚清藩属国政策的检讨	58
第三章 近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接受和采用	61
一、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61
二、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	73
三、设立领事与保护华侨	84
第四章 外交策略及其应用	100
一、择交结盟,“以夷制夷”	100
二、“以和为体,以作可战之势为用”	107
三、权其轻重,以得偿失	111
四、灵活机动,相机办理	116
五、其他策略	119

第五章 “外交之道与内治息息相通”(上)	
——外交为内政服务	123
一、外交以追求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	123
二、对使节使命的认识和实践	128
三、“使才与将相并重”	141
第六章 “外交之道与内治息息相通”(下)	
——自强为外交之后盾	150
一、欲御外侮,先图自强	150
二、“宗尚西法”——“宇宙之大势”	153
三、军事改革思想	157
四、工商富国,提高国力	163
五、人才思想	168
六、对“君民共主”的向往	174
结 语	178
参考资料和论著举要	181
后 记	191

第一章 思想成因

一、从时文制艺到经世实学

薛福成生长在一个清寒的书香之家，这个家庭榜运不佳。薛福成的曾祖薛世琛终生困顿场屋，不获一售，去世时还是个童生。祖父薛锦堂有所进步，科名也只到秀才而止。^①父亲薛湘（1858年去世），字晓帆，发愤读书，胜过乃祖乃父许多，擅长作文，颇为时人推重，特别受到曾国藩等人的垂青，^②因而在科举考试的路途上走得算是比较顺利，1831年中举人，1845年成进士，曾先后任镇江府学教授、湖南安福县令。至此，薛家的状况才算有所好转。

由于薛湘中举后“恒橐笔游四方”，薛家家政主要由薛母顾氏主持。^③因而，薛福成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便主要是和诸兄弟跟随母亲顾氏一起度过的。^④顾氏家族为无锡望族，薛福成的外祖父

① 斐大中等修：《无锡金匱县志》卷16，页18；卷22，页41。光绪七年刻本。

② 薛福成《上曾侯相书》有言：“昔先人以文辞受知门下。”薛福成：《庸盦文外编》卷3，页3。

③ 薛福成：《先妣事略》：“府君既举于乡，迄成进士，恒橐笔游四方，先妣主持家政，自婚嫁宾祭以至延师课子，区处井然有程度。”薛福成：《庸盦文编》卷3，页25。

④ 薛福成兄弟6人，依次为福辰、福同、福成、福保、福初、福庚。其中，与薛福成关系密切，对薛福成有较大影响的是福辰和福保。福辰，字抚屏，1855年中举，精通医道，因曾治好慈禧太后的病而有名于时，历任直隶通永道、顺天府府尹、宗人府府丞和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职。福保，字季怀，先后佐山东巡抚阎敬铭和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丁宝桢幕，多所赞画，然仕途上郁郁不得志，年42卒。分别见薛福成：《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督察院左副御史薛公家传》，《庸盦文别集》，第240~2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母弟季怀事状》，《庸盦文续编》卷下，页44~47；黎庶昌：《诰授光禄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薛公（福辰）墓表》，《拙尊园丛稿》卷2，页47~48，光绪二十一年金陵状元阁刻本。

顾钧是国子监监生，她赠资政大夫，但是在薛福成的母亲5岁时就去世了，家道中落，薛福成的母亲依母成立，自幼过着“作苦如淡，衣食仅自给”的生活，但是她却极富有同情心，对亲党中之饥寒者，“痛自节啬，稍周其衣食”。18岁嫁给薛湘时，薛湘还是个穷教书先生，家境贫困，她“裁冗辑匱，佐以女红”，辛劳操持，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①

由于薛湘常年在外谋食，顾氏不但挑起了作为母亲应担负的照料福成兄弟饮食起居等生活方面的担子，更以福成兄弟的教育为己任。她课子读书，不是采用疾言厉色的强迫方法，而是以慈母特有的那种爱心，对福成兄弟循循善诱，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使福成兄弟在一种比较宽松的氛围中自觉地努力读书，获益良多。多年以后，薛福成深情地回忆说，“先妣于福成兄弟，未尝加以疾言厉色，然教诲不少倦。每归自塾中，必亲理其余课，寒暑风雨之夕，一灯荧然，诵声至夜分乃罢。暇则为言某能读书，身享令名，荣及父母；某不能读书，污贱危辱，濒于死亡。福成等耸听汗下，罔敢自逸。故督责非甚严，而所学或倍常程。府君自外归，辄又喜曰：‘虽吾自教，不过是也。’”而且，顾氏性情淑均，敦族睦邻，责己严而待人宽，也给福成以很大影响。^②

薛福成自幼接受的教育，毫无疑问是和当时一般读书人一样的教育，读的是四书五经，做的是举业功夫，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登龙门，入仕途，光宗耀祖，飞黄腾达。但是，他所处的时代，是个内忧外患交织的时代，外有资本主义列强的侵袭，内有太平天国、捻军等的起义，再加上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薛福成的思想发生了变化。1840年爆发的英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对少年薛福成似乎没有什么影响，毕竟在薛福成懂事时，这场

① 薛福成：《先妣事略》，《庸盦文编》卷3，页25。

② 薛福成：《先妣事略》，《庸盦文编》卷3，页25~26。同文中薛福成还回忆说：“先妣御下宽，虽臧获贱隶，不忍斥其名，闻人有过，唯恐彰之。福成兄弟习其意，自幼至长，未尝敢以恶声加人。”

战争已经过去数年，当时的中国也没有几个人真正认识到了这场战争对中国的重大意义，自然也不会对薛福成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薛福成懂事之后，这时的薛福成已经开始独立思考某些问题，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对他有所触动，使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他后来回忆说：“往在十二三岁时，强寇窃发岭外，慨然欲为经世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乃摈弃一切而专力于是。”^①

但是，在实际上，少年薛福成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摈弃时文制艺而专心致力于经世实学。1855年，他的长兄薛福辰中式顺天乡试第二名举人，在同年的会试中，虽未中进士，但通过议叙、掣签，以员外郎分发工部行走。长兄的少年得志，对17岁的薛福成无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当时社会的风尚和清政府的用人制度，也使得薛福成不可能放弃科场上的竞争。根据已经刊行的材料分析，薛福成在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的同时，仍花了相当的精力角逐于科场。但是，由于科举制度到这时已经完全僵化，而且腐败透顶，舞弊成风，或许也因为他没有全神贯注于此的缘故吧，他“累试累摈于有司”^②，到30岁时才考了个不能进京参加会试的“副贡”，此后便放弃了这一无谓的努力。

薛福成经世致用思想的确立，当始于1860年。这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近尾声，皇皇大国再一次败给了一直被中国称作“夷狄”的西洋小国。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不同，这一次英法联军不仅将战火烧到了北京，赶跑了皇帝，而且抢掠焚毁了有“万园之园”之称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在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多个不平等条约中，再次侵夺了中国大量的利权。这次战争对中国的打击远远超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失败，使相当多的中国人感觉到了沉痛，认识到中外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极不利于

① 薛福成：《上曾侯相书》，《庸盦文外编》卷3，页2。

② 薛福成：《诰受奉直大夫户部云南司主事王君墓志铭》，《庸盦文编》卷4，页36。

中国的变化，正如总理衙门后来指出的：“庚申之衅，创巨痛深。”^①“变局观”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天地之变局”、“古今之创局”、“千古未有之局”等描述当时局势的说法频繁地出于人们的笔下。^②国内，太平天国到这时已经定都天京7年之久，建立了稳固的政权，据有了江南半壁河山，薛福成的家乡无锡即在太平军占领之下。内忧外患，使清王朝朝野上下忧心忡忡，坐卧不宁。薛福成虽然还不是清政府的官僚，但是他见“时变方殷”，乃于兄弟薛福辰、薛福保在“避寇”期间（1860～1865年）^③“互相切磨，研极经济及古文辞，浩然有用世之意”，^④“昼则纵观经史，质问疑义，夜则一灯围坐，互论圣贤立教微旨、古今理乱得失之要最，有不和，则断断辩难。”^⑤在经世之学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862年（同治元年）秋，薛福成赴北京参加科举考试，但是他却不像其他人一样安心准备考试，而是很有些不务正业，甚至是唱对台戏，一方面批评科举考试，另一方面大讲“时务”：“是时海内多故，余悯夫沉溺声病小楷之学者迷不知返，辄举时务所宜施行者以语人人”，效果自然可以想见：“同坐者或引去，或桥舌愕眙”，只有一个叫王绾字莘钮的“独倾听叹服，谓非笃于俗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册，第2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② 关于近代的“变局观”，请参阅王尔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一文，见其《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③ 1860年5月底，太平军占领无锡，薛母避居江北的宝应，福成与乃兄福辰在湖南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后，辗转千里，“微服穿贼境”，“航海涉江”，来到宝应，奉母在此“乡居以避寇”，见薛福成《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督察院左副督御史薛公家传》，《庸盒文别集》，第240页。

④ 薛福成：《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督察院左副督御史薛公家传》，《庸盒文别集》，第240页。

⑤ 薛福成：《母弟季怀事状》，《庸盒文编》卷3，页7。